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军 杨富学 主编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先后定居过羌、戎、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于阗、回鹘、党项、蒙古等多种民族。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在今敦煌地区现存的900余个洞窟中，有不少就是由少数民族或在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开凿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古代少数民族文献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丝绸之路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

樊锦诗 才让 杨富学 主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樊锦诗 才 让 杨富学 主编

丝绸之路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丝绸之路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 / 樊锦诗, 才让, 杨富学主编.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5.1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ISBN 978-7-5423-2957-8

I. ①丝… II. ①樊… ②才… ③杨… III. ①丝绸之路—民族—文献—研究 ②丝绸之路—文化研究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0478号

出版人：吉西平

项目负责：白 鑫

责任编辑：孙宝岩

封面设计：徐晋林

丝绸之路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

樊锦诗 才让 杨富学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40.75 插页 4 字数 650 千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5423-2957-8 定价：98.00 元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西部这片热土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及文献释读的深入，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出版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的图书数以千计，并且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论著问世。“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就是在以往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总结。



总 序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是中华民族得以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得以与西方文化实现交流，成为相互影响、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往的产物，是东西文明相互撞击的结果，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文化价值所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接触与交流，并在以后的交往进程中共同进步。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从人类发展的愿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鲁番。”

敦煌、吐鲁番作为四大文明汇聚之地的代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长安、于阗、龟兹、楼兰、张掖、武威、天水、西宁、固原等

地也都莫不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而著称于世。穿越西北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重要商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甘肃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唯一不变的交通干道，也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最典型、最丰富的地区。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河陇地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之地，更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的枢纽。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吐鲁番文书与石窟、居延汉简与悬泉汉简、黑水城文献、藏文文献等大量古代的文化遗存的相继发现都令世界震撼。丝路文化也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最为耀眼的部分，以致对其研究成为东方学诸多学科领域内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必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如今随着考古及文献的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耕耘下，获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有关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方面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而且研究范围正日益扩大，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学术成果涌现。

甘肃学术资源丰富，然而就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而言，无疑应首推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三者可并称为拉动甘肃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三驾马车”。甘肃教育出版社

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立足本地，传承文化，追求特色，出版精品”的原则和方针，先后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推重。这套“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的策划与出版，正是该社突出“敦煌文化”与“丝路研究”主导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选题又都和丝路沿线纷繁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息息相关。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是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其中的各分册图书，在该学术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当然，这 12 册图书只是国内敦煌与丝路文化的部分成果，我们今后还将进一步通过出版续编的方式逐步完善，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正。

文丛的作者，既有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也有青年才俊，更多的则是在这一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中年学术骨干。本丛书从策划到编辑，得到了诸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完善书稿到认真校对，都付出了不少辛劳，从而保证了书稿的写作质量和出版质量，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此外，不少年轻人，如甘肃省博物馆的赵天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彭晓静、王东、张海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志鹏以及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俄玉楠、史淑琴、阿尔斯兰、史亚军等都参与了本丛书的具体工作，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保证了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

俄军 杨富学

2014年元旦

目 录

关于西北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的国际交流合作问题

..... 柴剑虹(1)

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塔波寺文书和《禅定目炬》研究:对新近

研究成果的评述 沈卫荣(4)

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号《般若心经》研究 才 让(25)

英藏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编目状况述评 牛 宏(42)

海外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 束锡红(48)

敦煌文书 P.3885 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

..... 陆 离(62)

宗教文化对吐蕃职官管理制度的影响 朱悦梅(79)

《善日文献》文化价值初探 西热桑布(96)

我国察合台文及其文献研究 张铁山(101)

论蒙元时期回鹘文的使用状况 王红梅(118)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ragments of a Clear Script Manuscript

of the Thar-pač hen-po Found in Qinghai

..... OTGON BORJIGIN, Ph. D.(129)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 董晓荣(140)

敦煌莫高窟 464 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杨富学(152)

瓜州东千佛洞第 5 窟西夏供养人初探 张先堂(189)

莫高窟第 148 窟对中唐敦煌石窟的影响 赵晓星(200)

一座反映唐蕃关系的“纪念碑”式洞窟

——榆林窟第 25 窟营建的动机、思想及功德主试析

..... 沙武田(206)

妙见菩萨寻踪

- 图像与宗派研究习作之二 李 翱(235)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龙年”题记试释 王惠民(246)
敦煌饮食文化的若干特点论略 李并成(260)
S.2472V《佛出家日开经发愿文》小议 马 德(267)
唐代西域告身研究 李 方(273)
荆州四层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最终形成地和传播源头
..... 张子升(286)
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事迹及相关归义军史研究 杨宝玉(298)
唐宋婚俗中女家单独“宴客”仪节
——以敦煌《荣亲客目》文书为中心的研究
..... 刘再聪 阴朝霞(325)
杏雨书屋藏《天复八年(909)吴安君分家遗书》校释 张小艳(339)
敦煌文学中的婚礼仪式及其文化空间 陈 烈(367)
河西镇墓文丛考
——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五 吴浩军(385)
敦煌的身占文献与中古身占风俗 王晶波(463)
敦煌写本《咒魅经》研究 王友奎(478)
《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佛经残片缀合初步研究 赵鑫晔(505)
从《好了歌》看王梵志诗歌的文化意蕴及现实意义 王志鹏(520)
王梵志出生故事考论 邵小龙(536)
敦煌书仪研究综述 伏俊琏 杜 海(543)
《慈悲道场忏法》与莫高窟第98窟 刘永增 陈菊霞(557)
莫高窟第17窟壁画主题浅探 高启安(583)
观音三尊式造像的传播与流变
——以观音三尊像从印度雕刻到莫高窟唐代说法图的
演变为线索 史忠平 马 莉(600)
敦煌研究院藏拉萨下密院金马年铜釜考 张延清(615)
敦煌《维摩诘经变》壁画中天女手持毛扇式麈尾图像研究
..... 杨 森 王建华(623)
敦煌石窟窟顶四角天王图像研究 米德昉(631)

关于西北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的 国际交流合作问题

柴剑虹

近几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其显著的标志就是由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和国外收藏机构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英、法、俄藏若干种藏文、西夏文文献的图录本。

从汇集散藏国外的文献，并使之回归、正式刊布，给学界和文物界提供资料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从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角度看，也应予赞成并鼓励。

在这种国际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我个人以为还必须予以重视，兹以我们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为例，提出来供编撰者和出版社参考：

第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西北地区文物的流散以及中国学者参与研究困难重重，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令国人和学界痛心疾首之事，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今天合作整理出版，应该对这段历史有正确的认识，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应该在中方的“序言”、“前言”及“出版说明”中表明我方的态度，即：盗掘我国文物并运出境外，是完全非法的，应予谴责；目前收藏单位为保护与研究这些文物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肯定，但这些文物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中国（季老的话）；中外双方应该通力合作将这些文物发掘、劫掠、流散、分藏过程的真相、实情、细节弄清楚。很遗憾，《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在这方面做得较差。中方主编的“前言”对日本“中亚探险队”盗掘、劫取我国西北地区文物没有丝毫的谴责，用的均是“调查”、“获取”、“得到”之类的词语，甚至比日方主编“前言”的叙述还要委婉。众所周知，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文物是最缺乏科学性的，常常缺乏原始的记录，造成后人研究的困难。至今人们对其探险队几名主要成员的真实身份仍不得其详。而且，日

本收藏品在日本国内外的再次(或多次)流散,也是较其他收藏国更为严重的,有的流落到私人藏家手中,知者对此往往讳莫如深。对此,我们是不能一味唱赞歌的。

第二,刊布出土文献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学术文化的发展。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国内外对这些流散文献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因此,我们整理出版这些文献的图录本,应该尽量反映学界的新成果,尤其是在这些文献的定名上,要更加科学、准确。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决不能盲从。遗憾的是,《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在这方面也有重大缺陷。此书所收西夏文献,之前日方虽均已正式刊布过,发表过许多研究文章,但可推敲之处仍有不少,现在完全沿用日方收藏机构、收藏者早先的定名(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西夏回鹘文书断简”),显然是欠妥当的。又此书“凡例”规定:“本书只选取了该藏品中有西夏文字的文献之页”,而实际上书中所收该断简 12—03a、12—05、12—06 及 12—07a\b\c 均系汉文。显与“凡例”有悖。该断简系张大千旧藏,据张自述得之于莫高窟,应该是他从莫高窟北区洞窟觅得;而另几件定名为“敦煌遗片”的西夏文佛经印本,张氏题署“癸未岁得于敦煌石室”,也明显有误(否则藏经洞历史当重写)。如果我们参考近些年来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的成果,应该会有新的体验。又本书所收“宁夏省黑城发现西夏经并元时代古文书”,系旧藏者日人清野谦次在昭和十三年(1938)的定名,尽管当时黑水城所在地额济纳旗归属宁夏省管辖,但后来已经先后属甘肃、内蒙古自治区,况且宁夏早在 1957 年 7 月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天我们出的书沿用“宁夏省”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该件其中编号为 26—26 的是对兽联珠纹样的丝织品,定名为“西夏经”当然也不妥。此件似于 1960 年 3 月即转藏天理图书馆,半个世纪来,应该有新的研究成果可以采用。

第三,今天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应该不满足于搜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刊布的状况,不仅在具体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前沿课题)上要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而且要特别注意取长补短,利用国外的优势,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过去学会的老会长季羡林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近些年来有关高校(如北大、兰大、人大、西北民大等)也有意识地将青年学者送到国外去拜师学艺,很有成效。我们在某些少数民族文字方面,已经出现了“人才链”的断却。例如古代吐火罗语言文字的释读目

前后继无人,法国皮诺教授近年来带的博士生,一位日本人,一位台湾省的学生,没有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日本藏西夏文文献》的中方主编通晓日文,却不懂西夏文,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83年成立之初,老一辈专家就以战略的眼光恳切地提出了人才培养的问题;今天的条件已远胜于30多年前了,应该在这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上述三点,依然还是个人很粗浅的认识和体味,决无批评责难之意,如果要批评,作为跻身于敦煌吐鲁番学界的一名编辑,我更应该做诚恳的自我批评。

(2011年7月12日)

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塔波寺文书和 《禅定目炬》研究：对新近研究成果的评述

沈卫荣

—

按照藏族自己的历史传统，藏文是公元 7 世纪中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Srong btsan sgam po, 617—650) 在位时创立的。为了传播佛法、翻译佛经，松赞干布特派其大臣屯弥桑婆达 (Thon mi Sambhota) 往天竺学习梵天文字，后者以梵文天城体为基础创立了藏文。从此时起至 9 世纪中吐蕃帝国崩溃，前后近 200 年时间西藏人创造了极为灿烂的文字文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藏文文献，特别是佛教文献。可是，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藏文文献遗存，除了吐蕃时期的金石碑铭，其他却都不是在西藏本土发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这些藏文文献写成的年代习惯被认为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即公元 786—841 年。^①但晚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在于阗地区出土的藏文文献类似，故应当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之后，或者说是在吐蕃帝国灭亡之后，直到公元 10 世纪末出现的作品。^②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对敦煌藏文手

① 对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议，有人提出应该是自 760 年代开始，详见 Bianca Horleman. A Re-evaluation of the Tibetan Conquest of Eighth-Century Shazhou/Dunhuang. *Tibet, Past and Present: Tibetan Studies I*, ed. Hank Blezer (Leiden: Brill, 2002), pp. 49–65. 关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的概述见 Géza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J. Harmatta,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9, pp. 275–306.

② Tsuguhiro Takeuchi (武内绍人). 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

稿进行古文书学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①总之，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古藏文文献大概是公元8世纪晚期的作品，尽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常被人认为是公元7—9世纪的作品。^②

此外，西藏历史传统还认为，藏传佛教于9世纪中叶末代吐蕃赞普朗达磨(Glang Dar ma)统治时期(841—846)，经历了一场类似于“焚书坑儒”一样的法难，以至于此前的藏文佛教文献丧失殆尽。藏族史家传统以朗达磨灭佛为分界线，将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历史分成前弘期(*bstan pa snga dar*)和后弘期(*bstan pa phyi dar*)两个部分，而二者之间有一个从9世纪中至10世纪中晚期的100余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前后弘期之间藏族佛教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以致停顿，故于西藏本土流传并保存至今的藏文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后弘期的作品。这种长期被普遍接受了的说法事实上是很经不起推敲的。前弘期的藏文文献，特别是佛教文献显然并没有全部遗失，相反绝大部分被保存下来了。《藏文大藏经》中保存了绝大多数前弘期译师们翻译的佛教经论，如吐蕃时期著名的三大译师莲花生和寂护大师的弟子吉祥积(sKa ba dPal brtsegs)、智军(Zhang sNa nam Ye shes sde)和龙幢(Cog ro Klu'i rgyal mtshan)等翻译的大量佛经都见于自14世纪开始编排、确定的《藏文大藏经》中。^③要是西藏历史上果真经历过与“焚书坑儒”类似的巨大法难，那么迄今《藏文大藏经》中几乎完

^① Jacob Dalton, Tom Davis and Sam van Shaik. Beyond Anonymity: Pale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ssue 3, 2007. 类似的讨论还有 Cristina A. Scherrer-Schaub.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Dunhuang and Tabo. *Tabo Studies 2: Manuscripts, Texts, Inscriptions and the Arts*, eds., Cristina A. Scherrer-Schaub and Ernst Steinkellner,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1999, pp. 3–36; Cristina A. Scherrer-Schaub and George Bonami. Establishing a Typology of the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ed.,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184–215.

^② Leonard van der Kuijp. Tibetan Historiography. José Cabzón and Roger Jackson eds.,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6, p. 39.

^③ 关于《藏文大藏经》的最新研究见 Helmut Eimer and David Germano eds.,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Buddhism*. Leiden 2000. Leiden, London and Koeln: Brill, 2002.

整地保留了全部的藏文旧译佛教文献是不可想象的事情。^①

藏族史家通常以 11 世纪的西藏大译师仁钦桑波 (Rin chen bzang po, 958—1055) 为界限作为划分佛教前后弘期的时间标准, 在他之前翻译的藏文密续称为“旧译密咒” (*gsang sngags rnying ma*, 或称“旧译” *snga'gyur*), 在他之后翻译的密续则称为“新译密咒” (*sgang sngags gsar ma*, 或称“新译” *gsar'gyur*)。按照这样的分法, “旧译密咒”就应当是前弘期的作品, 是在从公元 8 世纪开始直至 10 世纪末以前这一时期陆续翻译的。由于后弘期的“新译密咒”派僧人长期对“旧译密咒”的印度来源及其真实性、合法性表示怀疑, 故它们没有被编入《藏文大藏经》中, 但它们同样没有遗失。实际上, “旧译密咒”中有的是印度佛典的翻译, 也有的是藏人自己创作的作品, 还有很多是以“伏藏” (*gter ma*) 形式出现的。这些续部佛典文献中的大部分应该是在吐蕃王国灭亡以后, 大致从 9 世纪中至 12 世纪前期这段时间内翻译、创作或者发现的, 它们后来被另编入一部称为《宁玛十万续》 (*rNying ma rgyud'bum*) 的续部藏经而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②

《宁玛十万续》的形成正好说明通常被认为是处于佛教前后弘期之间的所谓“黑暗时期”实际上并不黑暗, 甚至并不存在, 因为后来成为藏传佛教之主流的密教传统正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③西藏本土至今没有发现前弘期留下的藏文文献遗存(手稿、抄本)有可能是因为 14 世纪前期以布思端 (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 大师为首的一批学者在那塘 (sNar thang)、蔡巴 (Tshal pa) 和夏鲁 (Zhva lu) 等寺院编定《藏文大藏经》, 即所谓“甘珠尔” (*bKa'gyur*) 和“丹珠尔” (*bsTan'gyur*) 时, 曾

^① Yamaguchi Z. 山口瑞凤. *The Fiction of King Dar-ma's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Du Dunhuang au Japon: 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 ed., Jean-Pierre Drège, Geneva: Droz, pp. 231–258.

^② 关于《宁玛十万续》的最新研究同样参见 Eimer and Germano eds.,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IATS 2000: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Leiden: EJ BRILL, 2002。此书的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宁玛十万续》的形成及其复杂性和权威性等问题。

^③ 详见 David Germano. *The Seven Descents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Rnying ma Transmissions.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p. 225–264; 关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密教传统的形成过程参见 Ronald M.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对当时所存的各种佛教经、续、论等多种译本有过一个系统的整理、甄别、修订和筛选的过程。除了被选入《藏文大藏经》中的那些曾被加工、修订，以后又不断被抄写、刊刻的译本外，其他的那些译本和著作稿就渐渐被淘汰，而最终被废弃，以至于至今再难找见了。很多未被选入《藏文大藏经》中的佛典异译本至少到 15 世纪时依然在佛教学者中间流通，像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中也还常出现对这些异译本的引用。^①

而更多的非佛教类古藏文文献也应当是在自 11—12 世纪开始的、由于西藏社会的全面佛教化而导致的西藏历史和藏文文献的彻底佛教化这一过程中渐渐被淘汰^②，以致最终全部不见踪影的。实际上，在后弘期出现的藏文史著和属于前弘期的古藏文文献之间，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连接点的，说明后者并不是于一朝一夕之间消失的。例如，被认为是后弘期第一部藏文历史著作的《巴协》(*sBa bzhed*)，其基础据说就是吐蕃王朝第一位出家众 *sBa Ye shes dbang po* 的传记，他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 strong lde btsan*, 755—797)时期人。所以尽管《巴协》有不同的版本，最后的版本有可能到 15 世纪才最终成书，其中明显掺杂了很多后期的资料，但其最主要的文献来源还是应当回溯到吐蕃王朝时期。^③晚近，Sam van Schaik 和岩尾一史两位先生合作，于夹杂在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文

^① 参见 Christian K. Wedemeyer. Tantalising Traces of the Labours of the Lotsāwas: Alternative Translations of Sanskrit Sources in the Writings of Rje Tsong kha pa.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Praxis*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ATS, 2003, Volume 4), eds., Ronald M. Davidson and Christian Wedemeyer., Leiden: EJ Brill, 2006, pp. 149–184.

^② 关于西藏历史的佛教化过程和佛教化西藏历史的创造参见 Matthew T. Kapstein. Remarks on Mani bKa’-’bum and the Cult of Avalokitevara in Tibet. *Tibetan Buddhism: Reason and Revelation*, eds., Steven D. Goodman and Ronald M. David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79–94; Zeff Bjerken. Hall of Mirrors: Tibetan Religious Histories as Mimetic Narratives. *Acta Orientalia*, 2002, vol64, pp. 177–223.

^③ Wangdu P. and Diemberger, H., dBa ’bzh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Transl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 of Tibetan Text*.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有关《巴协》与前弘期古藏文文献的关联以及它对于后弘期史家对吐蕃王国史的重构和创造的讨论详见 Matthew T. Kapstein.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2.